

典读党史

业界有声

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对待创作

《毛泽东年谱》里的文艺之三

阎晶明

的两首诗《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致信胡乔木，信中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关于郭沫若为毛泽东修改诗句，学者汪建新曾介绍说：《七律·登庐山》里，“跃上葱龙四百旋”一句，原先是“欲上逶迤四百旋”，郭沫若认为“欲上逶迤”四字有踟蹰不进之感，拟改成“坦道蜿蜒”。

1962年4月下旬，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请求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0余首中选出6首，略加修改，题为《词六首》，寄还编辑部，并请《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斟酌修改。

4月24日，获悉《词六首》准备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以及编辑部还希望得到《词六首》的部分手迹，在刊物上同时发表后，复信陈白尘：“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的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五月刊物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毛泽东总是谦逊地请专业的文学家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甚至直接修改。陈白尘是一位剧作家，估计他出于谨慎和谦虚未就毛泽东诗词作文字上的修改。方有此问。

也是在同一天，为《词六首》发表问题，毛泽东复信《诗刊》主编臧克家说：“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你细心给我修改了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27日，再次复信臧克家：“书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会见外宾时也会谈到文学。1963年11月24日晚上，毛泽东会见莫桑比克（后通译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桑托斯。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

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的反复修改，向他人请教、求改，出手发表之慎重，始终如一。“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想想，但不一定照意见直接改过，而是细心琢磨，力争完美。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为改诗事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首面上（形式上）感觉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写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成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不好为人师，还荐养名师，又忍不住要谈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且十分专业、内行，这是一种真心热爱诗歌、喜欢创作、乐在其中，又十分审慎地表达自己看法，不以诗人自居的品质和态度。这种虚怀若谷和谦虚谨慎，既是一种古风的传承，又包含着艺术真谛永无止境的认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守望真理 赓续红色血脉

——广西师大出版社“望道出版论坛·2021”综述

本报记者 张丽



主题书展

弘扬老一辈出版家革命精神

“望道出版论坛”旨在弘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广西师专中文科主任陈望道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守望真理、坚持大道，为学界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不断推出展现“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出版精品力作，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看来，此次出版论坛以“望道”为名，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传承陈望道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出版家的革命精神，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要求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非常契合。

“本次论坛的举办，既是深情表达对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们的敬意，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邓军希望广西师大出版社深刻掌握党发展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积

极宣传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发展当中取得的伟大成就、造就的伟大精神、形成的伟大思想，浓墨重彩地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把促进革命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和砥砺奋进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上，做好革命文化的弘扬传承、出版传播工作，在新时代有新作为，这是时代赋予出版人的崇高使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表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举办此次论坛，还是探索新时代革命文献收藏、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新路径，在赓续红色血脉中开创新篇的切实行动。

用革命文献讲好党史故事

在论坛现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出版精品书展吸引了诸多与会专家学者驻足浏览。《湘江战役史料文丛》《大变局下的国家治理：中国国家制度展开及战略思维》《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化广西》《初心如故》《云上光辉》《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从北平到延安》《天路行军1950》……数十种主题出版图书亮相，再加上刚刚完成出版的集湘江战役史料之大成者《湘江战役史料文丛》，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共创建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可谓在史料文献出版领域形成了一定特色。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副理事长聂震宁指出，革命文献史料的收藏、整理、研究及出版传播，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基础性工作；革命文献史料作为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主要载体，系统的文献整理，也是推进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要坚定文化自信，必然要加强革命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而在这个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的过程中，应把握文献史料出版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认为，“编辑出版工作，应当辩证全面地看待历史问题，有些内容可以拿来出版传播，有些内容可以拿来做研究资料使用。真正做到忠于历史，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及出版传播才能够获得健康发展。”

“革命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头。革命文献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也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用文献说话，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革命文化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探索实践。”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在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举措。特别是在再生性保护方面，为了减少革命文献的反复提存和翻阅，减缓其物理损坏，同时又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国家图书馆很早就对革命文献进行数字化的设想，目前正在有序推进馆藏革命文献的数字化工作。

与会专家学者还重点研讨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主题出版重点项目《中共创建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的编纂出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邓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描绘了共产党人的精神画像，“我们要传承弘扬好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人民至上、英勇斗争、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红色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田玄结合专业研究，对中共党史历史文献专题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前行与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共党史科学的普及与提升，中共党史历史文献专题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及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站立世界大潮潮头的核心价值观中的经典的优秀政治历史文化传播成果。”

评序专栏

隐藏在街景的中国文化

——读《〈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

龙晓昱

《清明上河图》可谓宋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以宏大的格局构思、细腻精微的笔触、考究的内容设计，再现了北宋这一中国历史上文化空前繁荣的朝代。历来关于这幅珍品图的研究不胜枚举，大多是从艺术成就入手鉴赏分析。其实，《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市井风物，更蕴含着历史文化价值。

《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以图读史、以点见面，由纵向的历史时间经度和横向的地理空间纬度两个方向出发，挖掘图中隐藏的各种社会文化细节。在细节的复原和考证过程中，补充大量历史背景知识和专业概念，力图引导读者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在本书自序中，作者就绘画的中西历史提出观点：“人类的阅读就是读图”。图像是跨语言、跨时间的，是对人类经验世界的直接描述和记录。现代社会赋予人们记录瞬间、凝固永恒的各种方式，信息的获取、储存和传播从未像今天这样便捷。绘画是图像的表现工具，作为一种最原始、最本能的记录手段，贯穿人类文明历史。在中西方，绘画不仅承载着记录的功能，更是艺术表达的直接媒介。要想了解一个国家、民族、朝代的真实面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到民间地头去观察，绘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

除了历史背景外，想要深入解读《清明上河图》，一定绕不开对专业绘画背景知识的了解。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画的绘画材料、绘画纸张、装帧形式等。其中分别介绍了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和中国绘画常用的散点透视法，而后者使得画面有多个观察点，对于长卷的创作更适宜。此外，对古人收藏名画逸事的叙述，十分有趣。

解读绘画作品，第一步是看懂内容，这在了解绘画背景和绘画技法基础上就能完成，然后第二步才是要看懂内涵。画作内涵如何，往往随时代变迁说法纷纭。中国文化素来注重以景寄情、以物明志，因此，对比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一个重写意一个重写实，一个重神似一个重形似。中国画发展到宋朝，对绘画精神内涵的追求达到新的高度，一幅画好不好，核心评价标准似乎变成了其传达精神境界的能力。当时流行的“能品、妙品、神品、逸品”的评价标准，即体现了画家从技法脱出，逐渐达到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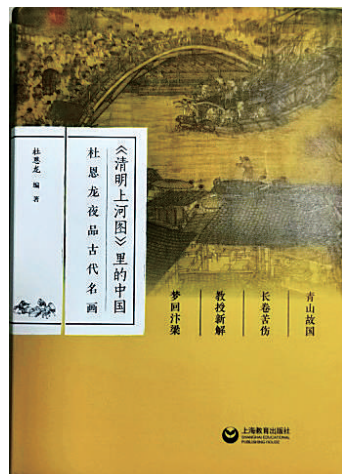
进入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市井生活的研究中，真正的阅读才刚刚开始。北宋市民经济繁荣，画中街道上各类商铺和生意都相当具有现代化气息。从旅馆、商店、医院、慈善机构、政府机构一应俱全。除了建筑，画面中最主要的角色是来来往往的行人。关于图中人物数量，历来争议较多，比较普遍的两种说法是500多人或800多人，包括郎中、官兵、乞丐、小贩、纤夫、修理工、商人、土人等角色。他们神态各异，每个人都盘算着自己的营生，其行为互动是画中颇有意味的研

究焦点。

读《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似将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其中闪烁着中国文化的点点星光。伴随小贩的沿街叫卖，城门口穿梭人群的脚步和马蹄声，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累积的璀璨物质、思想成果，被图中无数的细节解读串联。立足于《清明上河图》的原点，发散思维，在横向和纵向的历史中，复原一个朝代、一个文明古国的立体形象。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



《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是当代著名诗人。这一称号还不是从领袖诗词角度来讲的，他的诗词在意境和诗艺上都堪称一流，令许多专业从事诗词创作的人发自内心的钦佩。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其中，总是以谦虚的态度对待自己已经完成的作品，向各方面人士征求修改意见并认真思考、斟酌后臻于完善，是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一贯作风。以下几个例证很能说明这一点。

话说1956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筹备创办《诗刊》杂志。臧克家等以编委会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亲自审定自己创作的诗词，并同意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信中说：“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1957年1月12日，臧克家等人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说：“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者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毛泽东如此看待自己的诗词，当然是一种谦虚的态度，也体现出他对诗歌创作的敬畏以及在创作上永不满足的追求。

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这是一个创作者的心得，同时也是一种创作态度的表达。

1959年9月7日，毛泽东就自己

文化信息

首部以希腊文为母本的《理想国》中译本问世

首部以希腊文为母本的《理想国》中译本，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重要的著作，柏拉图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其他哲学家、思想家进行的对话为载体——实际阐述的是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对话共分十卷，主要论述了柏拉图心中对“理想国”的构建、治理和正义。著作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民主、宗教、法律、美德、人性以及形而上学等内容。

《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图举行

7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六十载使命接续 千百卷传奇完璧——《古本戏曲丛刊》编纂出版座谈会”在国图举行。来自全国的戏曲文献研究专家学者、古籍界、出版界专家对古代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展研讨。《古本戏曲丛刊》是由郑振铎发端并主持编纂，郑振铎计划编纂十集，并主持了前四集的编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1958年不幸殉职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新组织编委会，由吴晓铃继续主持编纂。1964年，《古本

戏曲丛刊九集》由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五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2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搁置近30年的《古本戏曲丛刊》第六、七、八集的编纂出版工作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积极争取认领承担了这一项目。2020年底，《古本戏曲丛刊十集》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全十集共收入元、明、清传奇、杂剧等1193种，合计成书141函1398册。（张丽）